

# 选择困境：信息时代的迷思

文 | 蒋家河 陈振华 梁铮



**[摘要]** 新传播技术革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次主体革命。新媒体环境下媒介和信息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同时也带来了主体选择的困境。选择性注意、记忆作为建构现代性的核心机制，形塑了信息时代关于技术和数据的迷思。面对新传播技术革命带来的危机和挑战，应当警惕技术决定论，重新思考主体的角色。

**[关键词]** 数据迷思 选择困境 新传播革命 **[中图分类号]** G20 **[文献标识码]** A

**新**传播技术革命，加快了社会结构和信息格局的变迁，也在更深层次上重塑了主体的角色。一方面，传播技术的演变带来媒介化生存和以智能设备为中介的社会交往形态；另一方面，信息海量流动增加了不确定情况下主体的选择困境。现实与虚拟的边界愈加模糊，主体的能动性遭遇解构的挑战。

## 理论传统：传播技术的现代迷思

西方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界对工业文明和技术的讨论由来已久。早期的研究主要围绕现代性的议题展开。无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韦伯对资本主义和基督新教理性化的思考，还是涂尔干对社会分工的诠释，汤尼斯对社区与社会的区分探讨，都试图对西方的工业社会进行重新定义，乃至反省和批判。进入20世纪，西方学界对现代迷思的分析弥漫着悲观主义的色彩，尤其是一战爆发后，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弊病和危机充满忧虑。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失望。后续研究中，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学者抛弃悲观论调，主张开展“公共领域”的“理性沟通”，重塑社会规范和公民共识。

在传播学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国际传播、科技领域的批判，英国的文化研究、法国的符号学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的批判等，都将矛头指向权力结构和迷思，致力于主体能动性的回归。

进入信息时代，西方学者围绕着新媒体环境下主体能动性的议题提出了新的论述。精神分析学者和社会学者注意到信息主体的媒介依赖和数字记忆带来的心理困境。特克尔(Turkle, 1995)认为，人们与机器的界限日益模糊，虚拟生存的现状迎合了去中心、应变心智、多元主体与后现代

自我的思潮。卡斯特(Castells, 1996)认为，媒介技术成为社会新秩序的结构力量，主体在虚拟世界中分化，导致身份认同危机。

文化研究学者则侧重于新媒介技术带来的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嬗变。霍斯金斯(Hoskins)认为，当代媒介参与社会转变的整个过程，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镶嵌在媒介视野之中。波兹曼(Postman, 1992)指出，人际关系反映了主体控制力的丧失和传统的遗忘。波斯特(Poster, 1995)从媒介技术批判视角分析现代理性带来的主体身份迷思和内在机制。

## 核心议题：信息如何建构迷思

近几年，互联网作为新的记忆媒介改变了记忆的建构机制，作为记忆运作的核心机制，“选择性”注意或遗漏成为学界探讨的中心议题。

传播学关于注意的选择性的研究颇有渊源。李普曼(Lippmann, 1946)关注到新闻报道中公众的选择性。拉扎斯菲尔德最早将注意的选择性运用到传播学领域，他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受众并非对大众媒介信息毫无区分，而是倾向于接触与既有的观念、立场相接近性内容。海曼(Hyman, 1949)把大众媒介传播效果甚微的原因归结于受众的“心理障碍”，即偏见、态度定向与预存立场。费斯廷格(Festinger, 1951)从认知协调的角度指出，人们倾向于注意与自己原有认知趋同的信息。克拉伯(Klapper, 1960)发现受众具有三种选择心理：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德弗勒(Defleur, 1975)也从个体差异、社会类型和社会关系阐释选择性机制的影响因素。

随着人类社会科技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熵”即社会生存状态及价值观的混乱程度将不断增加。主

体面临信息社会的庞大网络、海量数据的冲击,会产生焦虑与不安,并在林林总总的选择中陷入困境。既往研究中,传播学界对选择困境的成因分析主要有三种视角。

### 1. 媒介生态视角

20世纪30年代在北美萌芽的媒介生态学派,主张从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和物质结构研究文化导致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强调媒介自身属性是造成选择性机制的根本原因。

英尼斯(Innis)认为,媒介本身具有偏倚性。偏向时间的媒介倾向宗教、商业的等级制度和权威,不利于对边陲地区的控制;偏向空间的媒介侧重传播的通俗化、大众化,有利于文化知识传播和统治秩序的巩固。延续这一讨论,麦克卢汉(McLuhan)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从宏观层面和立体思维解读了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强大作用。波兹曼(Postman)在此基础上提出“媒介即隐喻”的说法,提倡传播技术是把双刃剑,每种技术都会给人带来深刻影响的哲学观念。

媒介生态视角对媒介的物理或符号特征带来的信息偏倚或倾向的观点,从结构上对信息越丰富、选择越多的迷思进行了剖析。

### 2. 媒介情境视角

20世纪80年代,梅罗维茨(Meymwitz)意识到传统媒介研究忽视了主体行为和结构变化的过程,她将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观点融入戈夫曼的“情境理论”,提出“媒介情境理论”,分析电子媒介环境下社会结构和主体心理、行为的转变。这一视角对于选择迷思的解读聚焦于特定情境下的主体如何与环境进行互动。

每一种行为都需要特定的情境来支撑,并随着情境的动态可变,电子媒介可以将不同的情境合并。因此,主体就像一个“透明人”,暴露在媒介的视野之下,在虚拟与现实的模糊边界钝化了自主性。

### 3. 传播心理视角

传播心理学延续了霍夫兰(Hovland)和勒温(Lewin)的传统,同时融入消费行为学、经济学的知识,关注主体和客体间的互动关系,以行为决策过程解释选择的机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Kahneman)等人发现,在选择评价和决策时,事物的客观状态与人们的主观心理状态并非直线上升,而是呈现逐步降幅的趋势。选择数量和复杂度的不断增加,使得做出选择的机会成本进一步加大,由原本的“收益”过渡为“损失”,其痛苦感高过同等程度收益带来的满足感。

施瓦茨(Barry Schwartz)认为,当选择权越来越多,表面上人们的控制欲增强了,实际上他们的控制力被削弱了。

对控制的渴望和期待总是跑在现实的前面,无论多大的自由都无法满足。

综上所述,选择性注意或遗漏,是传播技术建构信息迷思的核心机制,通过凸显、遮蔽、创造等方式,演变为正常化的权力运作。

## 现实反思：重塑主体的能动性

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自媒体的出现,极大地冲击着以权力为中心的传播格局,也深刻地形塑了主体与媒介的关系。主体兼具传者和受者双重角色,与媒介融为一体。

近年来,大数据在新闻传播学界引起热议。美国计算机专家斯基伊那(Skienna)和谷歌工程师沃德(Ward)利用维基百科和谷歌的大数据计算出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十个人的排名,结果出人意料,居然希特勒名列榜单,却没有东方人和女性的身影。博伊德(Boyd, 2012)总结大数据给文化、技术和学术界带来的诸多迷思,指出脱离情境的数据毫无意义,应警惕人类自身被工具化。部分学者关注到大数据可能带来的信息安全、国际冲突、数字化遗忘等现代迷思。以霍斯金斯(Hoskins)、露汀(Reading)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者注意到在数据繁荣背后的记忆碎片化危机。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的记忆呈现去中心化、碎片化的趋势,历史和记忆展开了互联网场域下的博弈。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选择更加丰富,同时也面临着选择困难、满足感降低、数字化遗忘等现代迷思。因此,在社会快速转型的另一面,需要防止技术决定论,重新思考主体的角色。中国教育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 参考文献

- [1]Boyd D, Crawford K. 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 Provocations for a cultural, technological, and scholarly phenomenon[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 15(5): 662-679.
- [2]Turkle S.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M]. Basic books, 2012.
- [3][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4][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5][美]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M].河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6][美]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M].周隽,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责编/孙李